

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看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

陶婷芳 钱世政

消费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活跃变量，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诱因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七·五”期间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概况及原因，以达到探索“八·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的目的。

一、“七·五”时期上海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的概况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上海居民在“七·五”时期，其生活消费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用的比重上升；吃、穿的比重基本持平；非商品的费用支出下降（见表1）。

表1

	吃	穿	用	非商品支出
六·五时期 (1980~1985)	56.1%	15.2%	17.6%	11.1%
七·五前四年 (1986~1989)	54%	13.6%	22.6%	9.8%

吃、穿、用及用于服务费方面的非商品支出变化的具体特点如下：

（一）吃的方面。

（1）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副食品消费比重上升。吃讲营养，这已是近几年来上海居民饮食消费的指南。1988年与1980年相比，主、副食品的比重发生了如下变化：

表2

	主食	副食(肉、禽、蛋等)	其它食品(烟、酒、糖果、糕点、罐头、饮料等)
1980年	18.2%	57.3%	24.5%
1988年	8%	62.1%	29.9%

（2）方便食品比重上升，膳食日趋社会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居民膳食社会化的程度也日益扩大。1988年上海居民人均在饮食业就餐的支出为32.52元，比1980年增长了4.6倍，饮食业就餐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9%上升到1988年的3.7%。

（3）消费水平提高，营养构成趋于合理。食品消费金额的增加，带来了营养水平的提高。在饮食文化和保健常识日益普及的今天，上海居民购买大宗食品时常从营养构成的角度观察，偏爱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副食品，从而使上海居民食品消费的总体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二) 穿的方面。

(1) 穿着支出增长幅度大于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尽管“七·五”时期比“六·五”时期穿着消费的比重下降了1.6个百分点,但其绝对数仍很大。1988年人均穿着支出达249.24元,比1980年的79元增长了170元,1988年的人均穿着支出是1980年的3.2倍。可见上海居民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正在有节制地适度增加穿着消费。

(2) 穿着讲究款式,服装趋向时令化。改革、开放10年以来,外域文化的流入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已使上海居民的审美情趣大为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化纤织物经久耐穿,已使上海居民置衣要考虑如何避免衣服过剩;再加上物价管理部门对服装行业实行的是新款式新价格的管理政策,也刺激了服装行业不断推出新款式,因而使上海居民的置衣变得更为苛刻,消费要求更高,即既要价廉物美,又要入时,且有个性。

(3) 置衣“成品化”,内衣“外衣化”。近五年来,居民的衣着支出中购买成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因为:第一,外出制衣环节多,费用高,人们不愿为做一件衣服等上一月半月的;第二,由于成衣品种多,样式好,可供选择的范围大,且为批量生产,费用相对较低;第三,服装的多功能化,品种的多样化。原来在春、秋季作为内衣穿着的薄绒衫裤、毛线衣、羊毛衫、运动衫裤也成为时兴外衣,从而使成衣购买比重大幅度上升。

(三) 用的方面。

(1) 日用消费品从“实用型”转向“享受型”。1988年上海居民人均购买日用品支出为378.6元,比1980年增长了2.7倍,比1952年增长了18.9倍。60~70年代人们购买日用消费品侧重于“实用”,而80年代人们着眼的是“享受”。

(2) 贵重消费品“普及快、换代快”。80年代,上海居民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出现了从购置“老五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黑白电视机)转向购置“新五件”(彩电、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的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末期,随着上海城市录音机、电冰箱的普及,市场逐步趋向饱和,新一代的“享受”用品又开始进入居民家中,如直角平面彩电、多门无霜电冰箱,大容量自动洗衣机。此外,录像机、电话、摩托车、空调已成为青年消费者们钟爱的“新四件”。

(四) 非商品支出费用呈下降趋势。

上海居民用于非商品支出的费用1988年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占8%,且多年来变化不大。与1980年相比,尽管人均房租、水电费、煤气费、学杂费、修理费、医疗费等均有增长,但从平均增长速度看,非商品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2.2%,低于商品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4.9%的增长幅度。“七·五”时期其占总支出的比重也比“六·五”时期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其一,我们国家的国力虽弱,但社会制度的福利性却较强,从房租到水、电、煤费用无一例外都有政府补贴。从今年起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其二,说明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还大有潜力,还有许多可以提供服务的领域,诸如旅游、文娱、保健等有待开发。

二、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

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在“七·五”时期出现以上这些变化,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由政府的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引起的。

80年代,尤其是“七·五”前四年,由于几次的价格改革方案出台,使得上海零售市场

的物价指数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个阶段，四年累计高达164.3。而且，提价项目由主要集中在食品类逐渐转向工业消费品类（见表3）。

表3

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分类比重表（%）

年份	食品类	工业消费品类
1986	92.5	7.5
1987	75.0	25.0
1988	68.5	31.5
1989	45.5	54.5

在物价剧变的情况下，居民往往会产生由“恐慌”心理引起的“逆反购买”行为。在逆反心态下，人们购买的动机是采用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等实物来实现保值，以致在“七·五”前四年中居民消费结构中的“用”的比重明显高于“六·五”时期。

（二）由职工工资收入的变化引起的。

1989年上海市职工工资总额为126.27亿元，比1985年增加了60.79亿元，增长了92.8%，平均每年递增17.8%。

特别是前几年由于企业在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企业竞相以多分为好。这种超前分配成了职工拥有巨大购买力的源泉，使职工的消费水平提前上了一个台阶。吃讲营养，用讲高档，穿讲漂亮，这已成为大多数居民家庭的需求趋向，这种新的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食品消费由吃饱向吃鲜、吃活、吃精、吃细方向转化，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化。二是穿着消费向美观新颖、质地精良方向转变。三是用的消费由日用必需品向具有艺术性的享受品转化。

（三）由城市人口年龄的变化引起的。

上海人口总量的控制是基本符合计划要求的，但内在结构却不尽合理，具体表现在：

（1）上海市的婚龄、育龄有所提前。在“七·五”时期，60年代初出生的人都进入了生育期。而新婚姻法实施后，结婚起始年龄提前，使得大量60年代中期乃至末期出生的人也加入了婚配大军。1984年全市平均初婚年龄是25.3岁，1987年降至24.6岁；1981年全市妇女生育峰值年值为26岁，1986年降至25岁，这导致了上海“七·五”前期人口出生率回升。80年代后期的新婚夫妇与新生儿这两支消费大军的消费水平是令人为之瞪目的。他们的消费特点是刻意求新，追求完美。一对新婚夫妇的新婚硬件投资（不包括房屋本身）一般为2万元，如高档的组合家具，带激光唱机的高级音响设备，大屏幕平面直角彩色电视机，大容量自动洗衣机，多门无霜电冰箱，乃至空调、电话、摩托车也不为少数人所拥有，这客观上增加了用的比重。一个新生儿的月消费一般占一个家庭总支出的1/2，如婴儿吃的有牛奶、助长奶粉、营养米粉；穿的有毛衣、薄绒衫、缎子衣裳；用的有高级推车、润肤露；玩的有电动玩具、电瓶汽车；洗的有“开心”浴露，洗发香波……这些消费不仅扩大了消费需求总量，而且提高了吃、穿、用的质量，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2）上海城市人口年龄老年化，也影响消费结构变化。据有关资料，1982年上海人口

的老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7.43%,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地区。1987年上海人口的老化系数已达8.50%,五年中上升了1.07个百分点,上海人口结构现在呈倒三角形,这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和期望寿命延长以及历史形成的上海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时期推延的必然结果。人口老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老人在走过了大半人生旅途后,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宁静、温馨的生存环境。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也随着时代的节奏在演变,但不同于年青一代。他们期望得到物质享受是作为对自己辛劳一生的回报。他们对保险、医疗、保健、服饰、文化消费等会提出一系列特殊要求。老年人独特的消费特性也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四) 由外域文化思潮所引起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有选择地摄入外域文化的营养,也会给上海人的消费结构带来变化,如前所述,青年夫妇的消费特点与受外域文化的示范效应的影响极为有关。再如国内旅游热的兴起和自娱自乐的卡拉OK的走俏,都与工作之余要好好乐一乐的思想密切相关。反映这一特点的是上跳舞厅、咖啡馆的饮食、服务业支出及旅游支出在本市居民消费支出中也有一定比重。

纵观80年代末期上海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居民消费档次多样化,消费品种多元化,消费水平在提高;可以预测一个趋势——90年代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将进入居民家中,享受兼实用的日用消费品会畅销。为此,我们认为根据这些消费特点,上海的产业与产品结构应及时作出调整,以便抓住机会,促进生产,推动市场,发展经济,为实现上海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奠定物质基础。

三、上海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对策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海90年代的产品结构调整应朝新、优、特的方向发展。所谓新——就是新产品、新款式、新品种;优——优质高档的产品;特——特色产品、特种产品、特殊产品。准确地说,广义的消费应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从它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看,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常为即期的或短期的产业结构变动的诱发因素,而作为生活消费依托的生产消费则为中、长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提供了指南。由于两者发挥的影响在时间分布上不一致,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的主要参数失真,使调控手段不是超前就是滞后。鉴于生活消费变动频率较快,宏观上不易控制其行为规范,因此我们着手分析的是这一变量变动趋势,着眼看的是与它成对应关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的观点是:上海的结构应朝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开发第三产业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一) 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是上海产业结构在转轨调整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当前上海的结构正处在合理转换的过渡时期,新一代的支柱产业尚未最终形成,而以轻纺为主的传统产业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其经济作用正在逐步减退。但就目前来讲轻纺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和生活消费品。基于这个特点,我们认为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并举,并以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不失为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首先,从国内和市内市场看,轻纺产品仍是人民生活消费的主要对象。近几年我国经济 and 人民生活均有所发展和提高,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阶段过渡。而小康型的实物消费特点,

在穿的方面,人均纤维消费仍应逐步增长;在用的方面,人均日用消费品拥有量应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日用消费品的质量也趋同步提高的趋势。鉴于小康型阶段的这些消费特点,我们认为更新改造传统产业也势在必行,一来是为了满足当前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二来也是为了引导和创造新的消费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满足了低层次的消费需要后,才会向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发展,而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正是新兴产业发展、成长、壮大的基础。相反,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引导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要引导消费新潮流,要想在开放的商品市场上争一高低,必须发展高技术的新兴产业。

其次,更新改造传统产业正是为发展新兴产业奠定物质基础。发展新兴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资金紧缺正是当前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困难。如何积累资金发展新兴产业呢?通过更新改造传统产业,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新一代的轻纺产品,就可能使市场复苏,使销售收入增加从而增加积累,为发展新兴产业准备物质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要把对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展新兴产业。

(二)大力开发第三产业,既能满足居民消费的需求也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必备的配套机制。

从前述的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上海居民工资收入增加了,对吃、穿、用的社会化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上班好好干,下班乐一乐的思想,使青年的娱乐消费增加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开放,使居民的证券投资意识增强了;房改方案的出台,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的兴趣;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又使老人对保险、医疗、保健服务提出了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人对第三产业有着更多的要求、更多的依赖。而上海目前的第三产业与此需求相比大为逊色。因此,我们认为,大力开发第三产业不仅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现代人生活消费的需要,是现代人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所以大力开发第三产业应该成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

目前,上海第三产业已有以商业、金融保险和交通邮电为支柱的26个行业,从直接经济效益和对其它经济部门的连锁效应出发,应用投入产出法进行分析筛选,表明金融业、商业、运输邮电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五大行业与加工度较深的工业联系较强,又是当前的“瓶颈”或薄弱行业,且盈利能力较强。因此,我们认为在90年代上海的第三产业首先应该发展这些行业,使其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配套机制,在促使上海城市功能转换、发挥上海多功能优势中发挥作用。

四、结束语

在本文结束前,需要说明的是: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单纯建立在上海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上是欠妥和不全面的。其一,上海的消费总额中,既有居民消费还有社会消费,而此文所谈的仅是居民消费。由于社会消费变动频率较慢,宏观上容易控制其行为规范,且比重低于居民消费,所以从略了。其二,上海的企业提供的消费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上海居民的消费,同样,上海居民选择的消费品也不局限于上海一个产地。所以本文所提供的仅是一种信息,作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时的参数而已。